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体育等西学逐渐传入中国。1914年杨翀宣任榆林殖边学校校长，设体操一课，此可视为榆林近代体育的萌芽。1918年，杜斌丞创办榆林中学时将体育引入学校教育中，榆林近代体育由此发展起来。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榆林有多地归属边区政府管理。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部队在榆林期间，努力推动发展红色体育，为榆林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体育人才。

第一节 榆林近代体育的发轫（1840—1936）

一、榆林近代的体育肇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最终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于次年，即1861年开始进行“洋务运动”。为了尽快培养各类新式教育人才，总理衙门于1862年成立“京师同文馆”。成立京师同文馆不仅代表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也代表着外国文化教育正式进入中国，可谓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肇始。^①

1895年，甲午战争的战败，象征着“洋务运动”仍无法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弱势，引发以改良主义为核心思想的“戊戌变法”，虽然仅持续短短逾百日，但期间不仅于各地广设新式学堂，其所传播的新思想与进行的改革，也象征中国教育思想已逐步受到改变，也为日后“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诞生埋下伏笔。^②

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颁布，该章程因为学制本身不完备及清政府对于拟定人的猜忌并未实行。

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颁布，该章程为中国第一个颁布后在全国实施的学制。^③

1904年，《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中明确指出“欲使全国人民克尽当兵义务，必先于学校教育趋重尚武主义”。^④中国近代体育在学制与教育的改革后，逐渐充满军国民教育的色彩。

《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榆林府即执行了《奏定学堂章程》的要求。当时榆林知府捐款将创立逾400年的“榆阳书院”改为“榆阳中学堂”。^⑤

改制后的学堂，依照“癸卯学制”的规定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等十四门新式学科。体操科采用大课制教学，在中学堂前两学年教授器具操，后两学年则兼授兵式体操。开设体操科象征着近代体育已经在榆林留下印记。^⑥

1905年，榆林知府因清政府废科举、以广学校、鼓励地方出资办学的机会，将中学堂的经费摊给榆林、神木、府谷、怀远（今横山）、葭州（今佳县）等五县，并改名为“五县中学堂”。

1910年，因为五县无法按时提供经费，导致学校停办。榆阳中学堂、五县中学堂的创办，把近代体育的种子埋进榆林，为日后榆林体育运动的萌芽做了初期的准备。

二、榆林学校体育的萌芽

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开始着手建立系统的学校教育体系，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文件。

1912年1月1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

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要求高等小学以上学校，应“着重注重兵式体操”。《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对学习年限及科目进行统一规定。除了小学需要体操及游戏并存外，中学及师范学校则要求学校需设置体操项目。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沿袭了“癸卯学制”大部分内容，兵士体操仍然作为学校体育的主要教学内容。当然，也有一些创新，例如增加了一部分游戏项目。由此可见，民国初年军国民思想对体育教育的至深影响。

此时的榆林地区由于中小学教育体系还很不完善，执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文件稍迟，其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建立政府要求的教育体系。

1913年，将原本已停办的五县中学堂重新办学并改名为“陕北殖边学校”，任命郭维潘为校长。

1914年，陕北殖边学校，改名为“榆林殖边学校”，任命杨翀宣接任校长。课程设置仍为14门，但部分科目的名称有所改变，例如废止读经讲经，将乐歌由随意课（同今选修课）改为必修课，中国文学改为国文，算学改为数学，法制及理财改为法制经济，

① 陈景盘：《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第8-10页。

② 陈景盘：《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第113、124、128页。

③ 陈景盘：《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第170页。

④ 罗时铭：《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第247页。

⑤ 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2页。

⑥ 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56页。

而乐歌则变成与修身、体操一样的全校大课形式。^①显然，此时的办学已经向现代化教育方向迈进，可视为榆林近代体育萌芽，也是榆林学校体育的萌芽。

然而，由于办学经费困难，该校最终停办。不过，从改革的方向看，已经认识到体操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初年所谓体操应理解为现代体育的代名词。彼时的体操不仅指现代意义上的竞技体操，还包括了其他现代体育项目。

1915年，道尹崔叠生委派杨翀宣重办学校，并改为“陕北中学校”，改造刘公祠为校舍，并在年底新增礼堂、膳堂、寝室及室外操场等场地。同年又因教育部实施教育整顿，强调地方民众有办学的责任，道尹吴敬之将中学校的经费由23个县共同分担，并改名为“陕北二十三县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以下简称榆中）。^②

榆林中学校前身的五县中学堂，时隔3年后重新办学，并在日后完善各项教学设施与设备，还根据课程设置和学生活动需要开辟室外操场，此举为学校开始正规的体育课程、课外体育活动与组织课余训练和竞赛提供了根本的物质保障。

杨翀宣积极在学校推动体育，不仅为学校带来了体育教育，而且为榆林现代体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杜斌丞与榆林学校体育

1. 返乡办榆中

1917年，由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毕业的榆林人杜斌丞谢绝北京好友们挽留，毅然放弃北京、天津待遇优厚的岗位。带着在北师大接受的新式教育思想，怀抱“教育报国”的理想，回归陕北，接受陕西督学袁刚的聘任，前往榆中任史地老师。

1918年，杜斌丞出任校长。接任校长后，他将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的“五育并举”思想中的三育“体、德、智”应用在该校的学生培养中。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榆林体育乃至教育界可谓先驱。

这种思想得益于他在求学过程中个人的成长经历。杜斌丞所在的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堂是当时我国最高的师范学府，学校按照现代师范教育构建了完备的课程体系。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修体育课程。杜斌丞求学期间对体育运动尤为重视，而且，由于出

众的身体素质，其本人的体育成绩也较为优异。从他求学时的成绩单可以看出体操成绩高于部分学科。^③

在榆林办学期间，他提出：体育锻炼应围绕注意锻炼、提倡劳动、增强体质，保证身体健康并反对成为“蒲柳之姿”。^④由此也不难看出，“蒲柳之姿”的体态并非现代社会才出现。

为了在榆中更好地开展体育教育，让孩子们享受到专业的体育课程，杜斌丞自北平（今北京）聘请肖一峰担任体育老师，增设体育课。^⑤可见其对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

其时，榆中开始的体育训练课程分为三部分：（1）正课，即体育课，其目的在于通过教授普通操、兵式操、器械操来促使学生身体各部分的发展，并养成刚毅、勇敢、坚忍的精神，遵守规律、协同一致的习惯，规定每周需进行两小时的正课教授；（2）课间操，每天20分钟全校课间操，目的在于通过四肢、首及胸部、肩背、腹及躯侧、跳跃、下肢及呼吸等身体部位的运动，促使学生活动身体，吸收新鲜空气，并矫正学生身体的不正确姿势、统一全校的精神及养成协同一致的习惯；（3）课外活动，目的在于通过实施球类游戏（篮球、排球、足球、网球）、径赛运动（5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高栏、低栏）、田赛运动（跳远、撑竿跳高、三级跳远、掷铁饼、掷铁球、掷标枪）等现代体育运动，以辅助正课及课间操的运动不足，该部分则规定在每日课后，学生自由练习，并有体育教员在场指导。^⑥以上课程体系表明，榆中的体育教育已经与现代学校体育教育的结构基本一致。而且，内容包括了专项运动、体能及健康运动等类型。

1919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五次教育联合会，对学校体育的改进进行了讨论。会后发布的文件指出：“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于教育之潮流，故对于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并拟定减少兵操时间、增加体育时间、增加体育经费、注重师范学校体育、注意女子体育、改良高等小学校国民学校体育、实行身体检查、改良运动会等多条学校体育改革办法。

这项改革对榆林的学校体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杜斌丞利用其良好的社会关系并取得道尹王健的支持，榆中不仅获得省政府约20000元的常经费，还获得来自二十三

^① 中国民主同盟榆林市委员会：《革命教育家杜斌丞在榆林》，2021，第5页。

^② 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8页、第22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榆林文史资料（第九辑）》，1989，第155页。

^④ 中国民主同盟榆林市委员会：《革命教育家杜斌丞在榆林》，2021，第72-73页。

^① 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6页。

^② 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3页。

县的集资。杜斌丞充分利用这两笔经费，动员学生一同扩建榆中大操场，体育教育的物质条件进一步改善。保证了榆中能够开展更多的体育项目，帮助更多的学生参与体育活动。

得益于学校体育的发展，榆中体育竞技水平在当地具有一定优势。不仅在学校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现代体育萌芽的时期也代表了榆林地区竞技体育的最高水平。榆中的体育印证了我国很多地方的现代体育主要传承于学校的论点。由于竞技水平高，1919年，榆中组织首届体育代表队参加陕北第一届运动会。

2. 组织学校竞赛

1921年，榆中在杜斌丞的倡导下，举办了陕北各县学生联合运动会（以下简称联合运动会）。^①为期5天的联合运动会在榆中操场进行，参赛人数达300余人。该项赛事仅限男选手，尚未出现女选手。竞赛项目也很丰富，不仅有足球、篮球、排球、网球（单双打）等球赛，还有田径项目，跳高、跳远、投掷、100米、200米、800米、1500米等。另外还安排了有障碍跑、跳绳跑、滚铁环跑（带钻铁环）、三脚跑、蛙跳、不倒翁跳、负重跑等趣味体育项目，甚至有石锁、石担等传统练力项目。

除以上提及的竞赛外，各校也准备了歌舞、哑铃操、集体跳绳、滚铁环等表演项目。该次联合运动会已经对服装进行规定，当时总司令穿着红色大袍，裁判员身着深蓝色中山装，运动员着上长下短黄边运动服，纠察队着蓝色制服同时佩戴红袖章。最特别



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

的是报告员，着特制虎皮色大衣，戴红帽，穿长皮靴并需要手持话筒，身背大木牌绕场传达命令与通报项目、成绩和新闻等。该赛事开启了榆林地区体育竞赛出售门票的先河，观众可以凭票进场观赏竞赛，而没票的观众则可以选择在校外的南东山上观看，足见此次联合运动会的吸引力。

本次联合运动会在仪式上已趋健全，组织竞赛的专业化程度较高。竞赛项目组成复杂多样，类似于现代综合性运动会。赛会不仅检验了榆林地区各学校的竞技体育水平，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锻炼了一批组织人才，为日后榆林开展竞技体育赛会打下了基础，提供了范本。

1925年5月，在杜斌丞的倡导下，陕北学界第一次联合运动会在榆中举办。^②此次

^① 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24页。

^② 中国民主同盟榆林市委员会：《革命教育家杜斌丞在榆林》，2021，第5页。



1921年陕北第一次各县学生联合运动会闭会摄影^①

赛会为期3天，相较联合运动会规模更大。有来自府谷、神木、绥德、米脂、清涧、葭县、横山等县的高级小学与各国民学校的选手参赛，参赛人数及观众达千人。因资料缺失，仅有绥德师范学院与榆中进行足球竞赛信息，其他体育运动项目则未有详细记载。根据报道，此次赛事已经出现女子运动员的身影。^②由此可见，当时榆林各地区之间开展了周期性竞赛活动，各校逐步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竞技水平的体育人才。这与榆林地区学校体育的普遍开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间，榆林学校间的体育赛事日益频繁。1932年，榆中足球队在与榆林职业中学足球队的竞赛中曾夺下两胜。

1934年冬天，“陕西省第六中学”改为“陕西省立榆林中学”。

3. 游说建立新学校

受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陕北妇女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但是，因为陕北女子国民小学校师资匮乏，妇女受教育的机会甚少。1926年在杜斌丞的倡导下，榆林道立女子师范学校成立。同年，杜斌丞因为身处陕北多年，希望外出考察学习，借此增长见闻，避免思想落后，随即向陕北镇守使署与榆林道尹公署称“宿疾时作，晋省就医”请辞校长。

1927年由杜斌丞举荐马师儒担任榆中校长。此后杜斌丞奔走于陕北各地，为兴办

^① 翻拍自米脂县斌丞图书馆。

^② 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12-13页；中国民主同盟榆林市委员会：《革命教育家杜斌丞在榆林》，2021，第12页。



1932年榆林中学足球队

了新篇章。

1927年4月，米脂县立初级中学（以下简称米中）在米脂县城北门外的盘龙山西侧真武祖师庙（今李自成行宫）内成立。由与杜斌丞同为北师大毕业的杜立廷任首任校长。杜立廷主张破除封建教育制度，提倡思想解放及新式办学，在米中设立女子部，不干预师生参加革命运动。

然而在杜斌丞离开榆林后，井岳秀加强了对学校的思想控制和组织干预。米中与榆中不再受到杜斌丞的保护，独立办学受到了冲击。米中也因此被改为“三民第二中学校”（以下简称三民二中）。

米中成立初期，因为校长及多数教师曾在北平、西安等地接受过新式教育，对于体育锻炼有正确的认识，支持开展学校体育教育。学校规划了每周两堂体育课，并聘请体育专业教师来校授课。

1928年，杜斌丞长子杜鸿范，返回米脂担任三民二中体育、军事教员。杜鸿范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军事技术过硬。他到米中后，将军事训练中的兵操和队列作为体育课的主要内容，使得米中体育课具有浓重的军事训练色彩。这种情况在当时我国各地体育教育中极为常见。

1929年春天，艾子高从北师大体育系毕业回到米脂，受聘三民二中体育教员。在他的规划与带领下，学校于盘龙山西侧开辟一块长200米、宽100米的操场，学校其他地点安放了乒乓球设施，此举说明此时该校有了乒乓球运动的迹象。他还带领学生一同安装篮球架、排球架、跳高架等体育器材，并利用这些简易的场地与器材，开展篮球、排球、田径、两人三脚跑^②、顶沙袋跑、哑铃操、网球运动等现代趣味体育运动。

① 中国民主同盟榆林市委员会：《革命教育家杜斌丞在榆林》，2021，第14-16页。

② 一种训练团队配合的跑步项目。

社会教育辛勤奔走。^①

4. 创办米脂中学

在离开榆中前，杜斌丞就曾与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周旋米脂开办中学一事，最终得到同意和支持在米脂开办中学，为米脂的现代教育开启了新篇章。

从他到米中所做的工作可以看到，米中已经引入了现代体育项目，其体育教育逐步摆脱了军国民体育教育的影响。

1929年7月，米中被国民政府以“赤化”的罪名封校。^①

在米中办学初期，体育教育的思想并不明确，基础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在榆林体育教育先驱的带领下，米中逐渐具备开展现代体育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米中克服封建思想的影响设立女子部，象征着米脂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始。学校也为当地女学生开设了体育课程，从而为榆林的体育发展再添一股新的力量。

民国成立初期，榆林地区承袭清朝末年充满军国民色彩的体育教育方针，直至第五次教育联合会后才逐渐转入发展现代体育运动教育。此后，榆林的许多地方学校引入了现代体育教育思想和内容，体育课程日臻完善。

杜斌丞在榆林十年的办学耕耘，为榆林留下了多所学校，带来新式教育思想与许多优秀教员。

因为杜斌丞本人受到过良好的体育教育，对体育教育认识深刻，因此，在其所办学校十分重视体育教育。这些学校通过体育课、课外体育锻炼和举办运动会等形式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体育在榆林地区的生根发芽，为榆林学校体育和现代体育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虽然这一阶段榆林学校体育教育历经波折，但是，得益于杜斌丞等教育先贤的不懈努力，榆林学校体育教育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① 米脂中学校志编撰委员会：《米脂中学校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第3、15、19页。

四、军事教育进校园

1927年，榆林各校出现了重大办学危机。因为杜斌丞请辞，导致榆中失去杜斌丞的社会关系，各校办学受到严重冲击。

出身于军旅，当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榆林镇守使井岳秀也不再支持榆中及米中办学。同时，他奉迎蒋介石反共行动，开始对共产党员及进步教师、偏红的学生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

1927年8月28日，发布第24号训令：查陕北近年中级学校陆续添设，而随事立名难能划一，又教育党化为中央所规定之教育方针，尤应切实进行，以端趋向。兹为名实相符起见，将陕北所立各中学校一律改冠三民名称，即将榆中改为“陕北三民第一中学校”。^①

1928年，陕西省教育厅拟在米脂设立“陕西省第六中学”，后因便利起见改设榆林，“陕北三民第一中学校”改为“陕西省第六中学”。^②同时，“榆林道立女子师范学校”在同年改为“陕西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③

1929年开始，教育领域增加了新的内容，“军事教育”进入学校。高级中学及初级中学所进行的教育内容不同。高级中学按照军队编制进行军事教育，军事教官由训练督导部门选派，各级队长实际上都是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对学生教导军事技术之余，还要进行思想和行动监视，也为国民党培养后备军。初级中学的军事训练则是进行童子军训练。此部分内容规划在体育课内。童子军教官以参加过庐山东亚体育专科学校附设之童子军教练员训练班的人员为主。榆中当时以初中为主，高中仅有两个班。

1929年6月，根据《陕西省童子军暂行办法》成立中国童子军陕西省立第六中学团，团长由童子军军部指派，副团长由体育主任及教务主任分任。

自此，榆林各校的体育教育基本为军事教育所替代。同时，在体育教师的努力下，一些现代体育项目仍然传承了下来。

1931年，榆中首次开展春秋季节运动会，直至1937年停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榆中的体育教学虽然受到军事教育的影响，但是，现代体育项目仍然在学生中广泛传播。而运动会的延续说明了赛会制度基本建立，人才储备比较充足。

榆林古时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民风彪悍，保留着习练武术的传统。民国时期，以“红



1937年陕西省立中学春季运动会

拳”最具代表性。

红拳是陕西地方特色拳种，其发源较为复杂，与中原地区长拳关系密切。红拳在关中和陕北地区均有比较清晰的传承线路。

井岳秀年轻时修习过红拳，对该拳种极为推崇。在其执掌榆林期间，陆续招募了许多红拳师傅来到榆林传拳，一部分武师在其麾下任武术教官或贴身保镖。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被称为西安十大武术教练之一——红拳泰斗朱耀亭，对红拳在榆林传习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有师从清代武术家及陕西高家拳创始人高占魁的安崇正，拜安崇正为师的王希真，安崇正关门弟子安文杰等红拳大师均来榆林传拳。

武术家来榆林后，不仅传播红拳，而且，还传承许多除红拳之外的兵器与拳脚套路，如猴拳、春秋大刀、梅花刀、白虎鞭、炮锤、黑虎拳、螳螂十三打、八部连环拳、双手刀、链枷等。^④使得榆林的民族传统体育更加具有多元特色。

同时，当时的榆林也开展了职工体育活动，参与者仅限于政府职员、教师及军人。开展的项目比较单一，只有田径及篮球等少数几个项目。虽然项目、参与者都很少，但已经有现代群众体育的雏形。

^① 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34页。

^② 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35页。

^③ 榆林师范校史编写组：《陕西省榆林师范校史》，1991，第37页。

^④ 郭凯：《红拳在陕西榆林开展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安体育学院，2017，第6-9页。

五、近代榆林女子体育

1936年,教育厅将原“陕西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改为“陕西省立榆林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榆女师)。

榆女师成立之初,办学就对体育教育比较重视。建校后,学校开设了体育课,同时,十分重视课外体育活动。每天下午均安排有体育指导员指导的一次课间操及一节课外活动。下午课外活动时,将学生分为若干组进行分组运动,并在一周内让各班学生轮流练习。习练的项目有篮球、排球、网球、垒球及田径。田径项目又涵盖短跑、低栏、铅球、铁饼、跳高、跳远等运动项目。

此外,学校的教职员组成了篮球、排球队,经常与榆林中学、榆林职业中学进行友谊赛。学校还有国术(武术)、舞蹈、健身操团体表演等,并且每学期都会举行运动会锻炼师生,促进健康。^①



各界联合运动会榆林排球队现场留影

1936年5月,在榆林各界联合运动会上,榆中排球项目夺得冠军,榆女师在篮球、网球项目上夺得冠军。此次联合运动会不仅有球类竞赛项目,还有约九项的田径竞赛项目。^②

这一阶段榆林学校体育日渐丰富,尤其是榆女师的

成立及其体育教育的勃兴,反映出自辛亥革命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扩散至榆林,象征着榆林女性在思想及身体上的解放,为日后陕北女子教育、体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榆林虽地处陕北,但现代学校体育较早抵达。不过,受到环境的制约,榆林当时的学校数量较少,学生人数不多,其影响力十分有限。虽然这一阶段榆林学校体育教育历经波折,但是,得益于教育界前辈的不懈努力,榆林学校体育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① 榆林师范校史编写组:《陕西省榆林师范校史》,1991,第37页。

^② 榆林中学校史编纂组:《榆林中学校史稿》,2003,第38、46页;榆林师范校史编写组:《陕西省榆林师范校史》,1991,第37页。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中的榆林体育(1937—1948)

1936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榆林进入国共分治阶段。

根据协议,榆林部分地区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以下简称边区政府)所辖。开始时,边区政府在榆林仅辖神府(涵盖今神木、府谷)、靖边、定边等地。1941年辖区扩大至神木、府谷、米脂、绥德、佳县、吴堡、清涧、子洲、靖边、定边、横山等县。这一时期,榆林地区主要为边区政府所管辖。

一、边区的军事体育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受到当时教育思想的启蒙和影响,对体育运动即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早年撰写的《体育之研究》中系统阐述了对体育的认识,提出了他的体育思想。这种思想指导着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体育发展。

早在江西瑞金时期,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带领下始终保持着体育运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体育运动与军事训练、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相结合的红色体育传统。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人将红色体育在陕北持续推进,影响了包括榆林在内的边区体育发展。

边区政府建立后,领导带头推动各地推进红色体育发展。边区的体育极具时代特色,结合抗日战争对人才的实际需要,显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 围绕战争需要并服务政治斗争,把体育锻炼作为提高战斗素质的重要途径,作为组织建设的手段,开展丰富多彩的军事体育锻炼。

(2) 广泛的群众性和坚持不懈的经常性,边区体育是全民体育,边区政府鼓励全体军民共同参加体育锻炼,体育不再是别人的专利。

(3) 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抗战时期,边区的经济落后、条件简陋,边区军民从实际出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开展各类体育运动。在地上竖起一根杆子,做个框子就开始篮球竞赛;摆上几个球门就可以踢足球;用木杆子加上排球

网就可以打排球；利用河流开展游泳、冰上运动；利用自制器材滚铁环。

(4) 丰富业余生活，激发人们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念。为了丰富边区军民业余生活，激发边区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念，边区政府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在条件十分简陋、斗争形势艰巨的情况下，积极组织体育竞赛，调动军民的积极性，表现了豁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发出军民抗战到底的坚强信念。

边区的红色体育发展中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体育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体育事业的栋梁。^①

八路军留守部队、边区保安队以及机关政府是边区体育的重要力量。八路军及其留守部队始终保持着红军时期形成的体育传统。在训练过程中，有负重长跑、单杠、双杠、跳马、刺刀训练、掷手榴弹、排球、足球等多项军事、竞技体育。战斗之余，军民还开展了广泛的体育竞赛。

为了保卫边区政府的安全，1937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各师之一部，共9000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即延安八路军留守处，并在延安设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同年11月，经与国民政府协商，为加强黄河河防，成立五县（绥德、佳县、米脂、清涧、吴堡）和神府、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八路军还在绥德设立了绥德警备司令部，在定边设立三边保安司令部、警备三旅，在神木、府谷设立神府河防司令部。

1938年至1939年间，由贺龙率领一二〇师一部，开始驻军于神府特区（今神木、府谷）。^②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同志是我党最早的体育事业领导人，始终积极推动体育发展。革命战争年代，贺龙同志提出以“体育运动军事化”为核心的体育工作指导意见。他亲自组建了著名的“战斗队”，以汇集革命军队中的体育精英人才，并着手培养优秀运动员。

该队包含篮球、排球、田径队，最著名的就是战斗篮球队。该队经常邀约当地学校、部队或机关政府进行友谊赛，在边区政府的各类赛事中夺得佳绩。一二〇师在抵抗日本侵略之余，也不忘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进行体育活动，时常在转移阵地时，在各驻地制造各种简易体育器材、开辟各类运动场或利用当地学校设备进行身体锻炼。^③战斗篮球队在各驻地的训练与建设，不仅起到锻炼战士体格的作用，而且间接地将体育运动风气带到神木、府谷等经过的每个驻地。

^① 王增明、曾颢：《中国红色体育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119-129页。

^② 《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至1945）》，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20，第161。

^③ 张家腾、孟峰磊：《抗战烽火中的“战斗篮球队”》，共产党员（河北），2022年第10期，第52-53页。

1943年1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为了加强北线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调习仲勋同志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在绥德专区工作时，经常在住处举石锁锻炼身体。

二、边区的学校体育

边区政府秉承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思想，积极开办学。边区各地普遍开办了小学，部分地区开办了中学。各地中学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开展了以军事体育为重点内容的学校体育。

1937年，边区政府制订了以国防教育为主的教育方针，指出：“边区教育的宗旨，是为争取抗战胜利，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培养有民族觉悟、有民主作风、有现代生活知识技能、能负担抗战建国之任务的战士和建设者。”

边区政府提出国防教育的实施原则共七点，分别为：（1）实行普及的免费教育；（2）学习课程力求经济化；（3）教育应和实际生活打成一片；（4）实行劳动教育；（5）发扬民主的精神；（6）实行自动的集体学习；（7）实行军事化的训练。其中实行军事化训练的原因，即为适应战时环境的需求，要求中等以上的学校实行军事训练，小学实行半军事化的组织，使学生在必要时可以直接参加抗战，也因此诞生了许多国防教育组织，如儿童团、少先队、民先队等。当时学生课外活动方面，主要是抗战的相关工作，如帮助放哨查路条，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进行锄奸、动员新战士、宣传放足、戒烟等各种宣传工作。^①

边区政府教育厅于1938年3月颁布了《通告——抗战时期小学应该注意的几个工作》。该通告中提出边区小学校为了适应战时的环境和需要，将需要的课程具体、快速地推动起来。具体内容如下：（1）学校军事化。为了配合陕北游击战术，提出在学

^①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第26-36页。



习仲勋同志在绥德分区工作期间时常用这个石锁锻炼身体

校要加强日常游戏体操,更要实习游击战术。具体实施时要求学生随身携带文具,上课地点不一定在室内,可随时转移上课,以备发生各种紧急情况时能立即转移。强调学生要每天爬山一次,练习山地战的技巧。要求按照军队编制来组织学生,在行动上与少先队同步。除了基本的劳动工作,学生也要学习侦察、信息传递等工作,以配合游击队行动。(2)课程重心转移。以统一战线和抗战教育为主,让学生对抗战的形势和工作有初步的认识。(3)课外活动。主要有五点:第一,小学应积极参加每个抗战动员的工作布置;第二,每个小学除学生需要参加少先队外,教员也应该担任自卫军、少先队的文化政治教员,以此提高两者的文化水平、政治思想;第三,通过小学生担任小先生,提高群众识字水平;第四,全体学生要优待抗属,慰劳他们;第五,春耕的配备,让学校负责医治两项作物,以解决教师及学生的生活问题。

从该通告中可看出,尽管陕甘宁边区在物资匮乏的时期,但仍坚持通过学校体育锻炼和劳动教育锻炼学生的体格,以做好边区遭受敌人攻击时的准备。^①边区学校体育的军事训练内容紧密结合陕北的地理特征,通过爬山等锻炼身体。

1939年8月,边区政府教育厅公布《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其中第四章课程的部分,明确指出小学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中心,并将社会活动及生产活动纳入正式课程之中,而社会活动包含以下各项:(1)抗战宣传及一般改良社会宣传;(2)优待抗属、帮助自卫军放哨、锄奸及其他抗战动员工作;(3)领导识字组、夜校、半日校等社会活动。^②此外,在课程规划表中发现,边区政府特别说明初级小学的“劳作以劳动为主,体育以军事为主”。

1939年7月,经过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的协助,陕西省立米脂中学(以下简称省立米中)成立,任命胡宗南亲信营尔斌为校长。然而时任校长的营尔斌,因为主持学校劣迹斑斑,引发学生反抗,在1940年2月逃往镇川,并将学校的教材、书籍、仪器等教学设备运往镇川。

自三民二中停办后,睽违十年终于复办,解决了米脂县内升学的困境。但将优秀师资及设备转移到镇川后,也间接造成省立米中的教学质量下降,对于米脂体育发展造成负面影响。^③

1940年5月,省立米中派郑忠良、常友玉等人率领两队赴绥德参加“五四”篮球、

排球运动会。男篮在此次竞赛中获得冠军,受到八路军359旅王震司令员表扬与奖励。^④

1940年7月,绥德专署为了与转移至镇川的省立米中做区别,将省立米中改为“公立米脂中学”。^⑤

1941年,边区政府扩大后,为了加强学校教育,将原来的“公立米脂中学”更名为“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以下简称边区米中)。创建初期,学校即创建了校男、女篮球队,常之俊、马克惠(女)分别担任男、女队长,男、女运动员有20位。之后,边区米中篮球队经常与八路军719团、2团战士进行竞赛,竞赛之余八路军战士向米中队员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与思想。

1941年,边区米中学生代表赴延安参观并进行交流竞赛,曾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球队进行竞赛交流。^⑥

1945年,边区政府在体育课程说明中明确指出:体育课应该与自卫军活动有实际意义上的军事教育的配合,使学生不仅能学到体育知识,也能具备一般的军事知识。例如防空、防毒、行军、一般操场动作、步枪与手榴弹的使用等,以锻炼体格,提高健康素养。^⑦

边区政府体育课程规划提出,小学体育课程更加强调将军事训练、生产劳动与体育运动相结合。体育课程既要照顾到学生强身健体、学习体育知识、培养运动技能,还要具备随时抗战的知识与技能。这种安排与抗日形势紧密结合,既锻炼了学生身体,也提高了他们的军事技能,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持久战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1942年米中出席专区首届运动大会全体运动员合影



1946年6月6日绥德分区运动会

^①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第1-3页。

^②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第60页。

^③ 米脂中学校志编撰委员会:《米脂中学校志》,2007,第11-14页。

^① 米脂县志编纂委员会:《米脂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651-652页。

^② 米脂中学校志编撰委员会:《米脂中学校志》,2007,第15页。

^③ 王增明,曾飙:《中国红色体育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第119-129页。

^④ 陕西省教育厅:《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教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第26页。

1946年，边区米中的体育开展愈发成熟，不仅在校内每星期都有竞赛，还举办过许多球类竞赛及两次运动大会。学校通过循环赛的方式来增加竞赛的次数，以吸引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关注，这种赛制类似于当代的联赛体制。

边区米中曾多次派学生代表队及职员代表队与其他机关团体进行竞赛。^①米脂在三民二中停办后的十年间，仍有学生坚持体育运动，且以篮球队最为活跃。曾与绥德队进行了竞赛，反映出同时期绥德地区也有体育活动。

三、边区的体育竞赛

广泛开展体育赛会是边区政府发展体育的优良传统。早在江西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就举办过综合运动会。

边区政府成立后，各地先后兴办各项具有纪念意义及历史价值的运动。如：“五一运动会”“五卅运动会”“八一运动会”“九一八运动会”“三八运动会”“九一运动会”“五四运动会”等纪念运动会。^②这些运动会均与国际社会、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通过举办体育竞赛纪念这些节日，激发人们斗志，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

边区政府初创阶段，由于环境所限，运动会多在延安地区举办，榆林地区也经常派队参加。同时期，榆林地区举办的竞赛较少。

1941年边区政府扩大后，米脂、绥德、佳县、吴堡、清涧、子洲、横山等县举办的小型运动会越来越多。如定边县篮球赛、横山全县小学春季运动会、神木县沙峁镇



绥德专区纪念五一、五四运动大会全体运动员合影

学生运动会、佳县通镇区学生运动会等。

边区政府还十分重视组织大型运动会，绥德县于1946年举办了“五卅运动会”。^③

边区政府所举办的各运动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现代体育运动项目，如田径、游泳、网球、

足球、篮球、乒乓球、棒球、武术等。另外也有极具军事特色的刺杀、实弹射击、障碍跑、掷手榴弹与政治测验等。

边区政府十分注重男女平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鼓励妇女参加体育活动、举办体育赛会推动边区妇女解放运动。

为此，边区政府组织了“三八运动会”，面向边区全体妇女。这对当时思想上还较为封闭的榆林地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妇女运动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男女平等观念，提高了妇女地位，有力促进了榆林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大批妇女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①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上）》，西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第240页。

② 陕西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陕甘宁边区体育史料（1935-1948）》，1986，第26页。

③ 陕甘宁边区体育史编审委员会：《陕甘宁边区体育史（1935至1948）》，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116-119页。

第三节 榆林其他县的体育（1937—1948）

一、学校体育及竞赛

在此期间，榆林其他县的学校体育也按照国民政府要求开展了体育课、课余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第三届陕西全省运动大会（以下简称省运会）在西安举行。竞赛共分为男子成人组、男子高级组、男子初级组、女子高级组、女子初级组等五组别。榆中体育教师曹文郁号召与组织各单位筹措竞赛经费，遴选榆林中学、榆林职业中学、米脂中学等12名学生代表一区参赛（一区辖榆林、神木、米脂、府谷、佳县、靖边、定边、横山）。

一区队经过长途跋涉，历时10多天到达西安。为节省费用未住旅馆，而是通过关系入住国立西北大学（今西北大学）教室中。

开幕式上，一区代表队员上着白背心，下着蓝短裤且鞋袜不一，足见当时的窘境。

虽然一区代表队运动员人数少，但参加的项目多。除了篮、排、足三大球竞赛，运动员们还参加了田径竞赛。代表队根据情况决定扬长避短，选择以排、足为主，田径以田赛为主的策略。

在男子高级组足球赛中，一区队与陇海铁路局为班底的西安队同场竞技。当时一区队仅有9人能上场竞赛，经队员多方联系后找到两位在西安求学的陕北学生加入队伍，才勉强凑足了数量。由于配合生疏，以0:1负于西安队，获得亚军。排球比赛中，一区队以3:0战胜九区队（九区辖今凤翔、陇县、千阳、宝鸡、岐山、扶风、武功、眉县、周至、麟游）；又以3:1击败咸阳队挺进决赛。决赛以3:1击败西安队，夺得冠军，并获得银盾一枚。^①

在其他竞赛中，一区队运动员高修礼在手榴弹掷远项目中夺得亚军。

本次比赛反映出榆林地区的体育有鲜明的特色，部分运动员在一些项目上竞技能

力突出。同时，也反映出竞技体育整体实力一般。

赛后，杜斌丞、高桂滋等宴请了一区队全体人员。11月中旬，在杜斌丞、高桂滋及陕北同乡的协助下，一区队返抵榆林。^②

然而，当时榆林政府不但未报销相关经费，还强夺排球冠军所获的银盾。队员们因此群情激奋，拒不上交。最后将此次获得的银盾、锦标及拍摄的照片都存放于榆中斌丞图书馆内。^③



一区队对西安队之排球比赛^④

二、军事体育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在学生中开展军事体育教育，以为战争储备人才。

榆中童子军进行了较为正规的军事训练。童子军训练以战地救护为主，还要进行队列、射击、结绳、旗语、走独木桥等项目的训练。童子军中有纠察棍、童子军棍架、来复枪、武装带、马步号等装备。

榆女师则较为重视童子军的野营训练。该校教官杨健三经常在童子军课后带领学生携带帐篷、行军锅等器材前往金刚寺进行综合训练，借此巩固与提高童子军知识并锻炼学生体能，以备战时之需。^④

1946年后，除学校外，榆林体育运动基本停滞了下来。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榆林文史资料（第九辑）》，1989，第154页。

^② 赵定明：《陕西全省运动大会：省立女子师范体育表演》，《艺文画报》1946年第1期。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榆林文史资料（第九辑）》，1989，第156页。

^④ 榆林师范校史编写组：《陕西省榆林师范校史》，1991，第41页。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榆林文史资料（第九辑）》，1989，第154页。